

牟宗三先生晚年的心願

戴璉璋*

民國四十年秋，我進入台灣師範學院（台師大前身）讀書，很幸運地正好遇到牟宗三先生在這裡講學。四年之間，我修習了他主講的四門課：理則學、哲學概論、先秦諸子以及中國哲學史。此外我還參加了他所主持的人文友會，兩週一次，從未間斷，即使在畢業後到新竹中學教書，仍然按時趕回台北聽講。牟先生講課，總是兩小時或三小時一氣呵成，他觀念清楚，條理分明，知識淵博，辨析精當，尤其難得的是對於傳統思想的詮釋與時代問題的解答，他都有超越時人的洞見與睿識，這對於我們這些流亡來台、在國家的苦難、文化的危機方面有迫切之感、切膚之痛、而又徬徨苦悶不知所從的青年人來說，極具啓發性與震撼力。以我個人來說，就是在他的引導之下才明白什麼是安身立命之道、什麼是學問、而且應該怎麼來研究學問的。

個人心目中，牟先生最令人敬佩的地方是他那學不厭誨不倦的精神。從他的著作年表可以看出：他的學術生命長達六十多年，而且一直保持著旺盛的論述活力。自二十四歲在北大哲學系三年級完成第一部著作：《從周易方面研究中國之玄學及道德哲學》起，此後即著述不斷。他可以在戰時的昆明三餐不繼的情況下草寫《邏輯典範》；也可以在華西大學只容一床一桌、站起來即頂著天花板的陋室之中研讀羅素與懷悌海合著的《數學原理》，而又自己撰著《認識心之批判》。年過六十，還寫出消化康德哲學以會通中土思想的巨著：《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》、《現象與物自身》、以及《圓善論》；年過七十，還獨力完成康德三大批判的譯註工作，出版《康德的道德哲學》、《康德純粹理性之批判》、以及《康德判斷力之批判》。這些著作，

* 本處研究員兼籌備處主任。

其功力之深厚、規模之闊大、識見之高明，學界已有定評；而其源泉滾滾不斷地湧現，一部接著一部不斷地刊行，則使我們驚訝、贊歎，且倍感壓力，因為前一部還未消化，新著又出版了。

有人說：牟先生的福份，主要來自師生緣。的確是這樣。他在大學時代遇到熊十力先生，這對於他來說就是畢生大事。熊先生對於他的學問有決定性的影響。至於他自己，通過講學、著作也吸引了許多仰慕者，追隨著他，執弟子之禮，向他問學。這些人之中，有的是學生，有的是軍人，還有一些則來自社會各階層。這些人多數是在存在的感受、時代的問題或文化的意識層面與牟先生的生命有真誠的呼應，而對於牟先生所講的「生命的學問」、「內容的真理」都有真切體會的。當然，牟先生本人那種突出不凡的生命風姿、率真脫俗的生活情調，自然也有一定的吸引力，讓年輕人對他由衷仰慕。他喜歡與年輕人相處，退休之後，仍然奔波於港台之間，講學不輟。即使到了八十高齡，青年學生邀請他講演，仍然會爽快地答應。晚年雖然體力漸衰，可是却閒不下來，每週還是定期到東方人文基金會的中國哲學研究中心去講學。當然，他在學生這裡也是得到一些回報的。他看到年輕人虛心向學、認真論道，便感到人間充滿著希望；他讀到學生們寫的文章，只要其中有一點可取，總是津津樂道，顯得無比的欣慰。他在病中，二十四小時守在床邊照顧的人是學生；他在病危，川流不息以各種方式來支持他與病魔戰鬥的是學生；他溘然長逝，含悲忍痛為他料理喪葬的也是學生。當然，在中國文化傳統之中，這些本是不必再提的常道；但是在今天這樣的社會風氣之中，能像牟先生這樣有師生緣、贏得學生敬愛而心悅誠服地事之如父的人，恐怕不易找到第二位了。

牟先生說：「我的一生可以說是『為人類價值之標準與文化之方向而奮鬥以申展理性』之經過。」（《時代與感受·序言》）從這裡我們可以了解到牟先生一生志業之所在；從這裡我們也可以了解到牟先生一生學不厭、誨不倦的動力根源之所在。目前我們這個時代，是價值標準混亂、文化方向模糊的時代。牟先生在這方面感受極深，憂患極切。他認為：「讀哲學的，處在這個非理性的時代，有其天造地設的命運（受苦），說得積極一點，有其天造地設的使命（天職）。若不能自覺地承當這命運或自覺地擔當這使命，他便不能盡其學哲學的本分。」（同前引書）牟先生對於他的命運與使命是有其自覺的。為了要求自己能盡其學哲學之本分，他在學思的路途中，翻過一山又見一山，解答了一個問題又見有新問題。於是總感到自己之不足，總覺得學不可已。他學不厭、誨不倦，一生寫了許多書，作了許多演講，希望能藉

此疏通中國智慧的傳統，化解中國文化發展中的癥結，進而申展理性，導正時風。他唯恐義理之不明，不知老之將至。

民國六十三年，牟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退休。此後他仍執教於新亞研究所，並且常常來台講學。台灣青年真誠向學的熱忱使他感動，於是他有在台成立中國哲學研究中心的意願。他認為研究中國哲學的人才必須長時期地加以培養，這不是目前大學研究所這種教學方式可以真正做到的，這須要有古代書院那樣的地方，提供師友論學的理想環境，讓年輕人沉潛其心志，凝聚其心思，在師友切磋之下，得到長期的薰習，從基礎文獻的整理著手，切實地去做客觀了解的工夫，鍛鍊出自己的功力，培養出自己的見識，然後從事相關的專題研究，這才可能真正成才而著有成績。民國七十三年暑假，我因事去香港，他與我談起關於這個哲學中心的一些構想，交給我一份這個哲學中心研究大綱的初稿，上面列舉了一些可以立即著手去做的課題，涵蓋面極廣，從先秦到宋明都有，分為「基礎文獻整理」及「有關專題研究」兩大項。我帶回來以後，與黃振華、蔡仁厚二兄商量，以牟先生這份初稿為基礎，擬出一份「中國哲學研究中心研究計畫草案」。這份草案對於哲學中心的研究目的、研究內容、人員配置、研究方式以及進行步驟等等都有具體的說明。牟先生來台講學的事，一向受到聯合報系大老王惕吾先生的重視，當王先生知道牟先生有成立中國哲學研究中心的意願時，他立即大力支持，於是這中心就在王先生贊助之下在民國七十八年正式成立於台北。它由東方人文基金會負責一切相關的規劃，五、六年來，規模粗具，研究成果也已逐漸呈現。牟先生來台定居之後，這中心成為他最喜歡去的地方，他在這裡與年輕人聊天，論學，痛快淋漓，暢所欲言，心情極為愉快。後來應大家請求，又在這裡設立講座，定期講學。這工作一直延續到他因病住院的前夕。

牟先生常說：「師生之間是慧命相續的。」這慧命，來自學術智慧，根源於民族生命、文化生命。他一生學不厭、誨不倦，就是希望這慧命能得以延續；他晚年要成立這個哲學中心，則是希望這慧命能長時期地永遠地綿延不絕。民國八十二年冬天的一個晚上，我與杜維明兄去哲學中心聽牟先生講課。在課後閒談中，我們向他報告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已經進行「當代儒學」的主題研究工作，今後還擬推動有關道家及佛學的主題研究，如果成果良好，這些研究工作都會長時期地進行下去。從這方面說，文哲所與哲學中心可以說是殊途而同歸，基本上都是要給予有志趣的青年學者一個良好的研究講習的環境，都希望能通過人才的培育以延續學

術文化的慧命。牟先生聽了我們的報告以後，展露笑容，狀至愉快，對於我們慰勉有加。那晚的情景猶歷歷在目，而今他老人家竟已與我們天人永隔了。今年三月間，我聽說他病危，急忙從南港趕到永和去看他。他躺在床上已不能言語，我們只能採取筆談的方式，我向他保證：他的心願、他的志業大家會繼續推展下去，使之恢闢開闊，成為中國哲學研究者的共同事業。我確信個人的這項保證會得到支持，這支持是來自所有讀他的著作而對於他的慧命有所感應的人那裡。